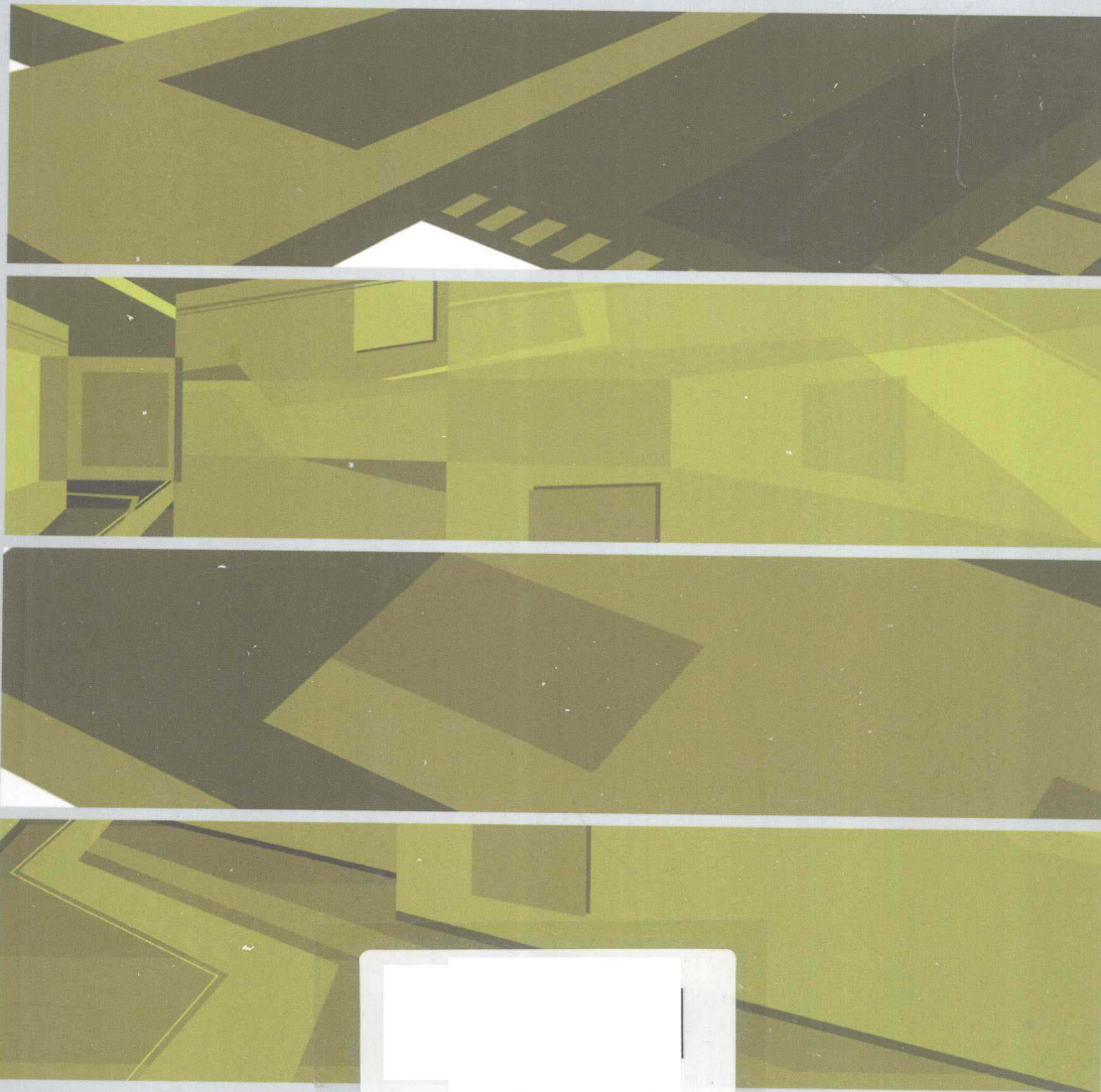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STUART HALL PAUL DU GAY



#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图亚特·霍尔 保罗·杜盖伊 / 编著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WENHUA SHENFEN WENTI YANJIU

#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英]斯图亚特·霍尔 保罗·杜盖伊 编著

庞 璃 译

顾 璇 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8—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  
庞璃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6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0151-6

I. ①文… II. ①霍… ②杜… ③庞… III. ①文化社会学—  
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5388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1996

书 名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著作责任者 [英]斯图亚特·霍尔 保罗·杜盖伊 编著  
庞 璃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郭尚兴

责任校对 张子言成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Editorial selection and matter ©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1996

Chapter 1 © Stuart Hall. 1996

Chapter 2 © Zygmunt Bauman. 1996

Chapter 3 © Marilyn Strathern. 1996

Chapter 4 © Homi K. Bhabha. 1996

Chapter 5 © Kevin Robins. 1996

Chapter 6 © Lawrence Grossberg. 1996

Chapter 7 © Simon Frith. 1996

Chapter 8 © Nikolas Rose. 1996

Chapter 9 © Paul du Gay. 1996

Chapter 10 © James Donald. 1996

First published 1996. Reprinted 1996, 1997, 1998, 2000,  
2002(twice), 2003, 2005, 2007, 2008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圣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根本有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 前 言

本书的各篇来自开放大学社会学研究组 1993—1994 年组织的一系列以“文化身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调查研究为什么文化身份问题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领域和社会科学、文化研究及人文学科的大量不同领域日益突出并获得关注。本书把不同的学科和传统理论集合在一起,意在启迪、推进“文化身份”的辩论研究以及深刻认识这种研究在当代社会形构中的意义。

本书的导言认同了一些在接下来的各篇中探索的主题,并提供自己的解释,解决为什么身份问题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同时又如此地解构和游离一种中心形式。然而,这份导言和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都不自以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甚至纲要性的框架。读者也不应指望完全同意这些撰稿人的观点。更确切地说,这本书的意图是给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和可能的分析线路拓展一个广泛的视野。

感谢给系列研讨会投稿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感谢亨瑞·利驰,他从实质上帮助了会议的组织并促进会议顺利进行,还有肯尼思·汤普森,他主持了许多的会议。我们还要感谢开放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其财力支持使会议得以举行。

最后,本书中每一篇的作者都进行了艰苦的、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工作。感谢他们,还有波林·特纳,她杰出的秘书工作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始终如一。



## 撰稿人简介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是利兹大学的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有:《朽与不朽及其他生活策略》(政治出版社)、《后现代道德规范》和《支离的生活》(布莱克威尔出版)。

霍米·K. 芭芭(Homi K. Bhabha)是芝加哥大学的英语教授。他的著作有:《文化定位》(1994)。

詹姆斯·唐纳德(James Donald)是苏塞克斯大学的传媒研究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有:《感伤教育》(维索出版)、合编本《种族、文化和差异》(圣人出版)、《空间和地点》(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他还编辑有杂志《影视教育和新构成》。

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是开放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学科帕维斯中心秘书。他是《消费和身份在运作》一书的作者(圣人出版,1996)。

西蒙·弗里兹(Simon Frith)是格拉斯哥克莱德大学约翰·罗杰·贝尔德中心的英语教授和合作主管。他的最新著作是《表演仪式:流行音乐的价值》(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美国北卡罗莱纳

大学传媒研究的莫里斯·戴维斯教授研究员。他是国际刊物《文化研究》的编辑。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我们必须脱离此地：流行守旧性和后现代文化》、《不由自主地舞蹈：文化研究论文集》（即将出版）和《“这是罪恶”和其他关于流行文化的论文及后现代性》（即将出版）。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的著作广泛涉猎文化、政治和种族领域。他最近的著作有：《现代性的构成》和《现代性和它的各种未来》(1992)。

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是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大学的文化地理学教授和城市与地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是《地理和媒体》(巴斯克维尔出版, 1993)一书的作者, 并和大卫·莫莱合著了《身份空间》(劳特利奇出版, 1995)。

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是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他著有《心理复杂性》(劳特利奇出版, 1985)、《发明我们的每一个自己》(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他最近在研究政治权力和行为管理的转换关系及技术。

玛里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是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她的《天赋之性》是社会和性别关系的人类学理论批评著作, 因为它们已被应用于美拉尼西亚黑人群岛, 同时,《模仿自然: 20世纪后期英格兰血族关系》(1992)评论国内的文化革命。她最近的著作是合编本《生殖技术》(1993)。

## 目 录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 I )
前言	( I )
撰稿人简介	( 1 )
1 导言:是谁需要“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 1 )
2 从朝圣者到观光客	
——身份简史	齐格蒙·鲍曼( 22 )
3 赋予身份权力?	
——生物学、选择和新的再生技术	玛里琳·斯特拉森( 45 )
4 文化中介	霍米·K. 巴巴( 66 )
5 撕裂的身份:土耳其/欧洲	凯文·罗宾斯( 77 )
6 身份和文化研究:这是全部吗?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109 )
7 音乐与身份	西蒙·弗里兹( 126 )
8 身份、系谱学、历史	尼古拉斯·罗斯( 154 )
9 组织身份:企业统管和公共管理	保罗·杜盖伊( 175 )
10 公民与都会一族	詹姆斯·唐纳德( 200 )
Index(原文索引)	( 228 )

# 1

## 导言：是谁需要“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

近来围绕“身份”这个概念确实一直存在着漫无限制的、不得要领的激烈争论，而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全面的批评，如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发展状态？这一概念把我们置身何处？许多学科领域都一直进行解构拆析，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完整的、初始的和统一的身份观念进行批评。后笛卡儿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对自给主体的批评在哲学领域取得广泛的进展。主体性及其无意识的形构过程问题在受心理分析影响的女权主义和文化批评主义的论述语篇中展开。无休止地述行的自我在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著名的变异形态中向前推进。在对文化身份和“地域政治”中的种族的、人种的和民族的概念所做的批评里，反本质主义者约略地以最基本的形式描述了某些具冒险性的理论概念。那么，进一步辩论“身份”有什么必要？谁会需要它呢？

有两种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

第一种是引人注目的解构主义批评，他们批评了大量此类本质主义概念。不像那些企图用所谓“更真的”概念来取代不充分的概念或热望产生肯定的理解批评，解构主义研究把关键的概念置于“抹除过程之中”。这表明这些概念以最初的和未重新建构的形式不再可用，即不宜用来思考问题。但是因为它们没有被辩证地替代，并且没有其他完全不同的概念来替代它们，所以还只能用它们思考问题——虽然目前这些概念以非整体和解构了的形式存在，而且不再

在它们最初生成的范式中起作用。取消它们的程式却自相矛盾地容许继续研究它们。德里达把这种研究描述为临界思考、间隔思考，是一种双重写作。“借助这种双重的写作——准确地划分，是概念已移位的和概念处于移位中的写作——我们也必须注意颠倒转化时的间隔，使得原来高的变为低的，而后一个新‘概念’就突现出来，这是一个包括在先前的领域里都从未存在而且也能不再存在的新概念”（德里达，1981）。身份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在逆转和出现的间隔里起着“抹除过程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不能以旧方式思考的观念，但没有这个概念某些关键性的问题就完全不能被思考。

第二种回答要求我们表明这个概念（身份）的还原能力与哪类问题相关？显现在哪儿？我认为这种回答在于这个概念对中介和政治问题的向心性。关于政治，我指的是这个能指（身份）的政治运动的现代形式的意义以及它和地域政治的极为重要的关系——同时也指显而易见的困难和不稳定性，这显著地影响了“身份政治”的所有当代形式。关于“中介”，我无意于表达究竟是什么重新采取这个主体或身份的无中介、明晰的概念作为社会实践的核心创始者，或恢复这样一个研究——“置自己的观点于所有史实的源头——简言之，导向一个先验的意识”（福柯，1970，p. xiv）。我同意福柯的下述观点，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关于需要认知的主体的理论，而是一个范围广阔、需要发散性实践的理论”。然而，我相信这个非中心化所要求的不是对“主体”的放弃或废除——正如福柯研究的演变所清晰地表示的——而是重新使其概念化，即换位到这个范式里的新的或非中心化的位置上来思考它。这看起来似乎是在企图重新表述主体和推论实践间的关系中，身份问题再次引发——或更确切地说，如果宁愿强调将发散性实践置于主观化的过程，并且所有这样的主观化看来似乎需要排斥政治，那么就再次引发——身份认同的问题。

身份认同结果就成为最不好被理解的概念之一——几乎有些具欺骗性，类似于“身份”自身，虽然比它更可取；并且当然不保证不会构成一直困扰后者的概念上的困难。身份认同从散发性和心理分析的全部储备上获得意义，且不受二者的限制。这个语义领域很复杂，

无法在这儿澄清，但至少需要指示性地确立它与所讨论的任务是相关的。用共识语言讲，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与“自然主义”这个定义形成对比，散发性态度把身份认同看做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在建构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无法确定它总是“赢”的或“输”的，受支持的或被遗弃的。尽管不是没有存在的确定条件，包括必需的支持它的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来源，身份认同最终还是有条件的，有偶然性的。身份认同一旦获得，就不会湮没差异。它所提出的完全的融合实际上是幻想。（弗洛伊德提及它时总是联系“消耗他者”，正如我们立刻就要看到的。）那么，身份认同就是一个清晰表达的过程，一个缝合的过程，是超定而不是归类。总是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要么过分确定，要么欠缺表达，但从未达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和完全意义上的合适。像所有重要的实践一样，身份认同是“运动的”、“异延的”。它遵从“从多不从少”的逻辑体系。并且，因为作为一个过程它对不同运作，需要承担大量零乱无章的推论工作、象征符号的边界束缚和标记以及“边界效果”的产生。它要求被遗留在外界的东西即它的本质外界去加固该过程。

从心理分析的使用角度来讲，身份认同继承了丰富的语义遗产。弗洛伊德称其为“和另一个人的情感纽带的最早表达”（弗洛伊德，1921/1991）。然而，在恋母情结中，父母既作为爱的对象同时又是爱的竞争对象，因此该过程的核心嵌入正反矛盾感情的并存。“事实上身份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充满歧义的”。（1921/1991：134）。在“悲恸和精神忧郁症”里，不是绑定某物于一个已存在的物体，而是把其绑定于一个已被遗弃的物体选择。首先是按“另一个来塑造”弥补了最初自恋的性欲愉悦的缺失。它基于幻觉、投射和理想化。它的目标对象既很可能是被憎恨的，也很可能是被倾慕的，这种可能性是对等的；而且同样的可能经常被带回无意识的自我，像是“提取自身”。就是在涉及身份认同时弗洛伊德精心阐述了“存在”与“具有另一个”之间的关键区别。“其表现就像是性欲机制最初的口唇期的派生物，其

间我们期待的物体靠吃来吸收,同时靠那种方式歼灭此物”(1921/1991:135)。拉普朗什和彭大历斯(1985)指出“视做整体的身份认同绝非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与超自我的中介共存的需求是变化纷繁的,有矛盾冲突,又无序混乱的一样,理想的自我是由身份认同和并不一定和谐的文化理想组成”的(p. 208)。

我并不是提议应全盘引进所有这些含义且无须转换进我们关于“身份”的思考,而是引用它们来表明这一新颖的意义,此中这个词条正发生变化。因此这儿展开的身份的概念不是本质主义者的,而是一个策略的和定位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与其已固定的语义进程截然相反,这个身份的概念没有表明自我的那个稳固核心,自始至终不变地贯彻演变于整个历史的兴衰枯荣;这一点残余的自我总是——已经保持“一样”——穿越时间与自己保持一致。如果我们把这个正本质的概念转化成文化身份阶段——“集体自我或真实自我隐藏于许多其他的、更表面化的或人为强加的‘自我’,一个享有同样历史和祖先的群体共有这些‘自我’”(霍尔,1990)——这一论述就不成立了,也不能稳定、确立或保证一个不变的“统一”或潜在于所有其他表面差异下的文化归属感。大家已认可身份从未统一,且在当代逐渐支离破碎;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必须使关于身份的辩论处于所有那些历史的特殊的发展和实践当中,这些发展和实践扰乱了许多族群和文化相对“固定的”特征,这首先涉及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我主张这些过程是与现代性相连的(霍尔,1996),而且与被强制的和“自由”的移民过程相连,这些移民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后殖民”世界的全球现象。尽管看起来似乎借助了历史过去的出身起源(他们仍继续与这个过去保持一致),但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我们有可能在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身份因此被构成在表现的内部,而非外

部。它们与传统的发现和传统自身发生同样多的关系，责成我们把这理解为“变换中的同一”（吉尔罗伊，1994）而不是作为无尽的重复：不是所谓的寻根，而是与我们的“历程”达成妥协。身份认同源自对自我的叙述化，但这一过程的必然的杜撰性绝不会破坏它的推论的、物质的或政治上的功效，即使是归属性，即使是身份得以产生的“缝合进故事”部分地处于虚构假想状态（也处于象征符号状态），那么因此总是部分地构筑在幻想中，或至少构筑在幻觉领域里。

正因为身份是建构在语篇内部而不是在外部，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它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及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而且是在特别特殊的散发形态和实践中产生，靠特别的阐释清晰的策略产生。此外，它们出现在特殊的权力形态的演绎当中，并因此而成为差异与排他的标记的产物，而不是同一的、自然构筑的统一体的标志——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即没有内部区别的包括一切的同性和无缝性）。

尤其是，与身份一直被采用的形式截然相反，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而不是从外部建构的，这就必然需要一些极端令人烦恼的辨识，只有通过另一方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关系以及与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任何词条的‘肯定’意义——它的‘身份’因此——才能被建构起来（德里达，1981；拉克劳，1990；巴特勒，1993）。通过身份的演变发展的历程得知，身份能被用来作为辨识和附加的要点只是由于它的排斥、略去和制成‘外界’的能力低得可怜。每一个身份都有它的“边缘”、剩余量或更多其他的东西。被身份这个词条当做基础的统一（内部的同质）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圈子的构筑形式，即使每一个身份是静默的和无语的，但都指定它所“欠缺的”为其必需。拉克劳（1990）自此使人信服地、强有力地指出“社会身份的构成是权力的行为”：

如果……客体性成功地部分肯定了它自身，那只是由于压制了对它构成威胁的事物。德里达已经表明了身份的构成是如何总是要排斥一些什么并在两个终极——男人/女人等——之



间确立一个极端的层级体系,等等。这样为第二个术语所独有的就归纳为事件的功能来与第一个术语的本质相对。这与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个关系中,白人等同于“人类”,“妇女”和“黑人”于是就成了注记词条来与“男人”和“白人”这些被注记的词条相对照。(拉克劳,1990:33)

所以“身份”所声称的“统一”其实是建构在权力和排斥的游戏当中的,因而结果不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或原始的整体,而是使人国籍的、超定的“圈文化”的过程(芭芭,1994;霍尔,1993)。

如果“身份”只能被理解得格格不入——就是说,特别是就其血统和稳定性而言身份不被解读为确定差异的身份,但作为被构成于或贯穿于异延中的身份却一直被它忽略掉的部分破坏其稳定性,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它的意思?如何将它的出现理论化?布菘(1992:143)在她关于《差异、多样性和区别》的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由这些使身份概念化的新方式引起的重要问题:

虽然范农在关于种族化的“他者”如何构成精神领域这个课题上还在进行很多工作,如何分析后殖民性及种族化的主体性?心理分析中“性别差异”和孩童早期的特权是否局限了它帮助我们理解诸如种族主义这样的社会现象的精神维度方面的解释性价值?“象征符号秩序”和社会秩序如何清晰地阐释主体的形构?换言之,如何建立关于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间的链接的理论?(1992:142)

接下来开始尝试回应这一系列关键的但棘手的问题。

关于这个课题在我最近所做的一些工作当中,我转用了“身份”这个词条,它当然不被广泛地共用且可能不好理解。我使用“身份”来指会合点,即两个方面的缝合:一方面是企图“质询”、责令或欢迎我们作为特殊语篇论述的社会主体的语篇论述和实践;另一方面是产生主观性的过程,建构我们认为能被“表达出来”的主体的过程。